
论初唐四杰文学经典地位的形成^{*}

——兼及人物并称与内涵的发展变化

洪迎华

内容提要 四杰这一群体在当世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因长期被“器识”抹杀，其诗史意义至元末《唐音》才开始被重视。入明以后，随着“四唐”说的定型，“四杰”不仅在称谓上与“初唐”连缀，其接受境遇也与“初唐”在“四唐”轩轻中的地位息息相关。嘉靖时初唐派的兴起，使得复古派取法乎上、将经典文本从盛唐扩及到初唐，四杰不仅被确立为诗歌摹习的典范，其唐音肇始的诗学意义也在中晚明被揭示和定位。万历以后因性灵思潮的冲击，明人的才性观发生变化，四杰终于从器识品行的揶揄中释放出来，文集与声名得以全面推显，至此，其经典化过程才基本完成。其间，从有才无行的“才子”到诗史上“初唐”的代表，四人并称的具体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关键词 初唐四杰 人物并称 始音 文学经典

“四杰”这一群体在当世即备受关注，历史上关于其排次先后、才行器识、创作成就等方面的讨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如今，“初唐四杰”为人熟知并在初唐占有不可缺席的经典地位。实际上，“初唐四杰”称谓的出现及经典地位的形成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间，四人并称的具体内涵也发生了变化。现学界对四杰及其创作本身的研究成果甚夥，亦相当深入，但对四杰在后世读者接受视野中的发展变化及其走向经典的具体过程，仍缺乏应有的关注。换句话说，四杰在文学史上是什么时候、如何被确立为经典的，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一 从“四才子”到诗史“四杰”：“初唐四杰”称谓的出现

作家并称是文学史上常见的现象，四杰亦主要以四人并称这一群体身份名世。因并称在本质上具有符号化特征，代表了被标举人物在某一时期或领域的声誉和影响，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故而讨论四杰的经典化，首先要理清的是四人并称的时间、名号、内涵及其在后世的发展变化等基本问题。

“王杨卢骆”是高宗武后时人，四人并称的名号，在当时即已形成并流传。张鷟《朝野僉载》载：“（卢照邻）婆娑于蜀中，放旷诗酒，故世称‘王杨卢骆’。照邻闻之曰‘喜居王后，耻在骆前。’”^①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谓“位曰大宝，才曰天爵。辞业备而官成，名声高而命薄。屈原不终于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明本唐人别集汇辑、叙录与研究”（项目编号21BZW093）阶段性成果。

^① 张鷟撰，赵守俨点校《朝野僉载》卷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1页。

楚相，扬雄自投于汉阁。……后复有王杨卢骆。”^① 郗云卿《骆宾王文集原序》云“高宗朝，与卢照邻、杨炯、王勃，文词齐名，海内称焉，号为‘四杰’，亦云‘卢骆杨王四才子’。”^② 张鷟、宋之问、郗云卿三人生活的年代与四杰同时或稍后，这几则材料是四人并称的最早记载，之后刘肃《大唐新语》、两《唐书》的相关记录皆源自此。从原始材料看，四人并称的主要层面在于才情气质，“放旷诗酒”“四才子”之号、宋之问以“王杨卢骆”为例讨论才与命的关系，直接佐证了这一点。

稍后不久，杜甫在《戏为六绝句》其二中对四杰大力推赞“杨王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③ 这一赞誉足够吸引眼球，加之诗中所言十分含糊，宋代即开始对杜甫所论产生争议。一者，“当时体”是文，还是诗，宋人的看法并不相同^④，洪迈谓“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骈俪作记序碑碣，盖一时体格如此，而后来颇议之。杜诗云……正谓此耳。”^⑤ 认为杜甫所言指四杰的骈文。而严羽《沧浪诗话》直接将其定义为诗体“以人而论，则有……沈宋体（侏期之问也）、陈拾遗体（陈子昂也）、王杨卢骆体。”^⑥ 二者，宋人对杜甫所推“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地位也不苟同。葛立方谓“而杜独取垂拱四杰何邪？南皮之韵，固不足取，而王杨卢骆亦诗人之小巧者尔。至有‘不废江河万古流’之句，褒之岂不太甚乎？”^⑦ 张戒则认为“此诗非为……王杨卢骆而作，乃子美自谓也。”^⑧ 然“杨王卢骆当时体”“王杨卢骆体”的提出，显示人物并称的意义已开始从“才子”向文学风格转化，尤其是严羽，明确将其视作一种诗歌体式，对引领后人关注四杰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

真正使四杰开始在诗史意义上得以并立的，是元末杨士弘不满之前选本略于盛唐而编选的《唐音》。“音也者，声之成文者也，可以观世矣”^⑨，“求之音律，知其世道”^⑩。杨士弘在《唐音姓氏》中将唐代诗人分为唐初盛唐（武德至天宝末）、中唐（天宝至元和间）、晚唐（元和至唐末）三个时期（《唐音评注》，上册，第1—7页），选本的编排上则“审其音律之正变”（《唐音评注》，上册，第8页）分始音、正音、遗响三类，认为诗“至开元天宝间始浑然大备，遂成一代之风”（《唐音评注》，上册，第74页），得音律之纯，系世道之盛，为唐音之“正”。同时，又不完全以时代为断限，在“正音”“遗响”的诗歌收录中跨越了不同时期，而“始音”唯录王杨卢骆四家，序曰“自六朝来，正声流靡。四君子一变而开盛唐之端，卓然成家。观子美之诗可见矣。然其律调初变，未能纯，今择其粹者，列为唐诗始音云。”（《唐音评注》，上册，第1页）且不分体，《凡例》谓“以其四家制作初变六朝，虽有五、七言之殊，然其音声则一致故也。”这一论说，首次揭示了四杰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初变意义，使四人并称有了新的诗学内涵。

① 董诰等《全唐文》卷二四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册，第2442页。

② 骆宾王著，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77页。

③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一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册，第898—899页。

④ 当今学界对“当时体”的解说亦不一。如周裕锴《王杨卢骆当时体——试论初唐七言歌行的群体风格及其嬗递轨迹》（《天府新论》1988年第4期）将“王杨卢骆当时体”定义为在初唐颇为流行的七言歌行。祝尚书《论初唐四杰骈文的“当时体”》（《文学遗产》2017年第5期）则认为“当时体”指的是文体，即文章的体制、结构、风格等。实际上这种分歧从宋代就开始产生了。

⑤ 洪迈《容斋随笔·容斋四笔》卷五“王勃文章”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册，第671—672页。

⑥ 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诗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58页。

⑦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下册，第502—503页。

⑧ 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下，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第466页。

⑨ 虞集《唐音原序》，杨士弘编选，张震辑注，顾璘评点，陶文鹏、魏祖钦点校《唐音评注》，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上册，第1页。

⑩ 《唐音评注》杨士弘原序，上册，第8页。

“始音”一列，实际上将“唐初”与“盛唐”区分开来，视其为一个重要的诗史阶段，从而促进了初唐阶段在唐诗分期中的独立。学界对此已有所关注^①，但“初唐”独立的过程及其对“四唐”定型的意义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唐代文学发展脉络的梳理中，最早呈现出明确分期的是《新唐书·文艺传叙》所提出的“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叙将“三变”归为“高祖、太宗”“玄宗”“大历、贞元间”三个时期，其中第一变“高祖、太宗”即接近于后来文学史上的初唐，但在具体阐述中，叙论仍将其视为六朝的延续，曰“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缙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杨为之伯。”^②这导致了第一变在实质上落空，“三变”论亦未在学术史上形成稳固的分期认识。故严羽提出“五体”时，直接将“唐初体”转换为诗风诗体的概念，注曰“犹袭陈隋之体”，而“盛唐体”（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体”（元白诸公、“晚唐体”（《沧浪诗话校释·诗体》，第53页）不仅有时间界分，也同时作为时间概念在使用，如《诗辨》曰：“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沧浪诗话校释》，第11—12页）之后方回编选《瀛奎律髓》，称盛唐（老杜同时人）、中唐（大历以后，元和以前）、晚唐诗皆取之^③，对盛唐之前则未提及。然其诗歌评点又涉及初唐，时而从溯源的角度称陈子昂、杜审言、沈、宋四人为老杜“律体之祖”，时而又将杜审言、陈子昂作为盛唐诗人^④。可见，自学人有明确的分期意识以来，自盛唐（玄宗）之后的历史阶段越来越明晰，但盛唐之前因与六朝“江左余风”相纠葛，在分期中一直处于含混不清甚至缺席的状态，因而出现了严羽使用“五体”视角不一、方回评点前后矛盾的现象。

《唐音》的出现，扭转了这一局势。其“始音”一说看到四杰初变六朝、开唐世之音的一面，正弥补了《新唐书》“三变”的理论不足。《唐音》问世后，“天下学诗而嗜唐者，争售而读之”^⑤。入明之后，亦被频繁刊刻印行，对明代唐诗学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影响即在于，明初又立足于“变”来讨论唐诗的发展和分期。如王祹《张仲简诗序》谓“唐之诗，始终盖凡三变焉”（始、盛、末）^⑥，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将唐诗分为“唐初”（开元以前）、“最盛”（开元至大历）、“变又极”（元和以下）三个阶段^⑦。但与《新书》不同的是，明人以盛唐为尊，唐诗由“始”至“盛”的渐变过程得以重视。王祹《练伯上诗序》曰“唐初，袭陈、隋之弊，多宗徐、庾，张子寿、苏廷硕……皆溺于久习，颓靡不振，王、杨、卢、骆，始若开唐晋之端，而陈伯玉又力于复古。此又一变也。”^⑧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对“唐初”从“承陈、隋之弊”到“陈伯玉痛惩其弊”的过程亦有相近的缕述。初唐由此逐渐获得独立的地位，至洪武年间正式出现了“四变”“四唐”说。

① 如王宏林《论“四唐分期”的演进及其双重内涵》（《文学遗产》2013年第2期）、张红《论〈唐音〉的唐诗学史地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张红运《“四唐”说源流考论》（《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②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〇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册，第5725—5726页。

③ 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卷一〇《春日题韦曲野老邨舍》诗后评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338页。

④ 如评陈子昂《送崔著作东征》：“陈子昂才高于沈佺期、宋之问，惟杜审言可相对。此四人唐律，在老杜以前，所谓律体之祖也。”评陈子昂《和陆明甫赠将军重出塞》：“盛唐诗浑成。”评梅尧臣《送任适尉乌程》：“圣俞诗一扫‘昆体’，与盛唐杜审言、王维、岑参诸人合。”（分别参见《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四、卷三〇、卷四，中册第1018页、下册第1303页、上册第170页）

⑤ 宋讷《唐音辑释序》，陈伯海、李定广编著《唐诗总集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上册，第253页。

⑥ 王祹《王忠文公集》卷二，《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22册，第54页。

⑦ 宋濂著，黄灵庚编辑校点《宋濂全集》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册，第58页。

⑧ 《王忠文公集》卷二，《丛书集成初编》，第2422册，第50页。

王行《唐律诗选序》谓“均之律诗，其变又有四焉，曰初唐，曰盛唐，曰中唐，曰晚唐。”^①之后高棅“巧用杨法”^②编选《唐诗品汇》，进一步明确了“四唐”的时间界限“唐诗之变，渐矣！隋氏以还，一变而为初唐，贞观、垂拱之诗是也；再变而为盛唐，开元、天宝之诗是也；三变而为中唐，大历、贞元之诗是也；四变而为晚唐，元和以后之诗是也。”^③其中初唐又被分为“初唐之始制”（贞观、永徽之时）、“初唐之渐盛”（神龙以还洎开元初）两个时段（《唐诗品汇》，上册，第8页）。除了以“四唐”为纲，在诗歌的选录和编排上，高棅以诗体分类、“九品”分目，以辨其源流正变和品格高下。“稍变乎流靡”^④“终未脱陈隋之气习”^⑤的四杰成为“初唐之始制”的一环，并被收录于“正始”之目下。

由上可见，四杰诗史意义被发现的背后，是初唐逐渐独立和唐诗分期的发展过程。《唐诗品汇》的编撰使“四唐”说形成了一个稳固完善的认识框架，“终明之世，馆阁宗之”^⑥。随着“四唐”说的定型，相对于唐诗学四个分期而言的“初唐四杰”或“初唐四子”才在文学史上出现。我们现已无从考定这一称谓最早出自何人何时，但从何景明《明月篇序》称“唐初四子”^⑦、边贡《游仙词赠李羽士拟初唐四子体》诗可以判断，前七子时期这一称呼已经较为普遍了。

二 “未放之花”与唐音肇始：四杰文学典范和诗史地位的确立

四杰并称向诗史方向的转化，无疑是这一群体走向文学经典的前提。“四唐”说的定型及“初唐四杰”称谓的出现，则进一步明确了四杰的时代属性及诗史位置。此后，四杰便在与“初唐”的捆绑下，进入明人的接受视野。这一群体后来甚至被视为初唐的代表，晚明胡应麟将唐代和明代各时期诗人进行对举时即谓“以唐人与明并论，唐有王、杨、卢、骆，明则高、杨、张、徐；唐有工部、青莲，明则弇州、北郡；唐有摩诘、浩然、少伯、李颀、岑参，明则仲默、昌谷、于鳞、明卿、敬美，才力悉敌。”^⑧要解释这一现象，还得从初唐派的出现及明代复古学说的变化这一学术背景说起。

弘治、正德年间，前七子在文学复古的道路上提出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的诗学主张，海内遵之。但因其创作陷入拟古的窠臼，声势至嘉靖初便已衰落，这时在诗坛兴起了初唐一派。钱谦益谓：“嘉靖初，王道思（慎中）、唐应德（顺之）倡论，尽洗一时剽拟之习。伯华与罗达夫、赵景仁诸人，左提右挈，李、何文集几于遏而不行。”^⑨初唐派成员陈束亦曰“弘治力振古风，一变而为杜诗，则李、何为之倡。嘉靖初元，后生灵秀，稍稍厌弃，更为初唐之体，家相凌竞，斌斌盛矣。”^⑩可见一时之气候。在诗歌取法对象上，尊盛唐的前七子也旁及初唐，何景明《海叟集序》谓：“（李杜）二家歌行、近体诚有可法，而古作尚有离去者，犹未尽可法之也。故景明学歌行、近体有取于二家，旁及唐

① 王行《半轩集》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31册，第357页。

②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一《集录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70页。

③ 高棅编选《唐诗品汇》卷二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第51页。

④ 《唐诗品汇》卷一，上册，第46页。

⑤ 《唐诗品汇》卷四，下册，第506页。

⑥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六《高棅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册，第7336页。

⑦ 何景明《何大复先生全集》卷一四，《明代论著丛刊》，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版，中册，第638页。

⑧ 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二《国朝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64页。

⑨ 钱谦益撰集，许逸民、林淑敏点校《列朝诗集》丁集第一《李少卿开先》，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册，第3991页。

⑩ 《列朝诗集》丁集第一《高按察叔嗣》，第7册，第3915页。

初、盛唐诸人，而古作必从汉魏求之。”^① 何氏《明月篇》、边贡《游仙词赠李羽士拟初唐四子体》便声称摹仿“唐初四子”，李梦阳五言古、七言古亦有《从军行》《出塞曲》《汉京篇》《明星篇》等“效唐初体”之作。然在前七子这里，盛唐终归是第一要义，初唐并非学习的经典。杨慎《升庵诗话》载“何仲默（景明）枕藉杜诗，不观余家，其于六朝初唐未数数然也。与予及薛君采言及六朝初唐，始恍然自失，乃作《明月》《流萤》二篇拟之，然终不若其效杜诸作也。”^② 即说明了这一点。“四唐”在本质上是一个描述事件发展先后顺序的时间概念，“有初而逗盛”，“逗者，变之渐也，非逗，故无由变”^③。“初”相对于“盛”而言，二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同一性和过程的渐变性。嘉靖初，原本倾重七子的王慎中、唐顺之等人悟其剽窃无真气，正是看到了初盛唐之间由“始”至“盛”的渐变过程，他们才取法乎上、转头在初唐诗这一源头活水中寻找生机。嘉靖十二年（1533），尝游何景明、边贡之门的樊鹏取贞观至开元间近体诗编成《初唐诗》，序曰“初唐诗如池塘春草，又如未放之花，含蓄浑厚，生意勃勃。……诚以律诗当于初唐求之，古诗当于汉魏求之。”王格在序中说得更明白“至乃初唐居近体之首，质而不俚，华而不艳，其浑厚蓊郁之气，有足观法者。余尝总括上世作者之家，品其大较，以为唐人斯作，亦犹三百篇有启周之盛，赋有屈原之体，五言有初汉之辞，皆当变更之始，为创制之宗。譬诸天地初分，百为未备，虽风教朴野而元气蔼如也。”^④ 其所谓“生意”与“元气”，即前七子复古中逐渐丢失的诗歌个性、情感及创造力。他们厌弃模效剽拟之习，并非反对盛唐诗。为矫正李、何之弊，他们思考的是如何学而得其法。王慎中《寄道原弟书七》曰：

每见世所称才子所作，不但去古人远，虽何、李二公，尚隔多少层数！然今人易足，又眼不明，或已有轻视两公之心，而自谓所作者，乃初唐也。不知初唐本未是诗之佳者，故唐人极推陈子昂，以其能变初为盛。而李杜继出，此道遂振。同时高、岑、王、孟乃其大家，今只取此六家诗读之，便知其妙，而见今人之所为者，皆陋浅无足观矣。

故为诗于今之时者，使真做出初唐诗，已为择术不高，况又不如初唐。……初唐之诗，千篇一律，数家之集，皆若一人；而一人之作，亦若一首。其声调虽俊美，体格虽涵厚，而变化终不足。盛唐之诗，则人人有眼目，篇篇有风骨。（王慎中著，林虹点校《遵岩集》卷二四，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617—618页）

依前钱谦益所言，王慎中、唐顺之是初唐派的倡导者。《明史·文苑传叙》亦谓“迨嘉靖时，王慎中、唐顺之辈，文宗欧、曾，诗仿初唐。”^⑤ 据李开先《荆川唐都御史传》记载，唐顺之受到了王慎中的启发才从追随七子转而宗初唐“素爱崆峒诗文，篇篇成诵，且一一仿效之。及遇王遵岩，告以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硬也。唐子已有将变之机，闻此如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矣。”^⑥ 初唐派具体的诗学理论记载甚寥，但从上《书》来看，初唐诗只是王慎中取法的一个路径，他真正推崇的仍是“人人有眼目，篇篇有风骨”的盛唐诗。在当时学尚初唐的风气下，他所关切的是“变初为盛”。王惟中《河南布政司参政王先生慎中行状》载嘉靖十四年（1535）王慎中转礼部员外郎后，“发篋中宋儒之书，尽读之，有味于欧、曾氏之文，以为世人谈文，皆卑宋人而云马迁、班固，不知善学马迁莫如欧，善学班固莫如曾，是欧、曾之文，盖原本经传，由《史》、《汉》之豪，一变而粹者也。先生以此自悟妙得欧、曾家法，乃取旧所作，尝所自喜以为汉人语者，悉焚之。诗亦以盛唐为宗，间出于晋魏风雅，旨趣玄妙，音节冲融，不专守唐人句字，而模写变化远矣。”（《遵岩集》附录一，第623页）可知其

① 《何大复先生全集》卷三四，《明代论著丛刊》，下册，第1257—1258页。

② 杨慎《升庵诗话》卷一三“萤诗”条，《历代诗话续编》，中册，第902页。

③ 王世懋《艺圃撷余》，《历代诗话》，下册，第776页。

④ 樊鹏《编初唐诗叙》、王格《初唐诗序》均见《唐诗总集纂要》，上册，第300—301页。

⑤ 《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传叙》，第20册，第7307页。

⑥ 唐顺之著，马美信、黄毅点校《唐顺之集》附录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下册，第1055页。

散文由尊两汉转宗欧、曾的同时，学诗也完成了由初唐而入盛唐的转变。其悟得的“欧、曾家法”，即学古而能得其精粹、“模写变化”，这实际上就是复古派的初衷。

初唐派在嘉靖初的兴起，为矫李、何之习提供了出口，使得复古派在推尊盛唐诗时，亦从考其成由、推源溯流的角度将经典文本扩及初唐，故嘉靖十五年（1536）前七子康海为樊鹏《初唐诗》题序“或曰‘唐初承六朝靡丽之风，非俚弗语，非工弗传，实雕虫之末技尔。子以雄浑朴略与之何邪？’曰‘正以承六朝之后，而能卒然振奋其气，词或稍因其故，而格则力脱其靡也。’或曰‘然则盛唐不足邪？’曰‘所谓文之以礼乐，而考得其成者也。’”^①之后，嘉靖七子重新举起复古的大旗，初唐诗亦成为他们眼中必读的文本。如谢榛主张学者“熟读初唐盛唐诸家所作”，选取其中最佳者兼容并取，“集众长合而为一”^②。王世贞在写给徐孟孺的书信中云“今宜但取三百篇及汉魏、晋宋、初盛唐名家语熟玩之，使胸次悠然有融浹处，方始命笔。”^③嘉靖后期也出现了专选初盛唐的诗集，如“盛行当世”^④的张逊业《十二家唐诗》，又如嘉靖三十一年（1552）刻张之象《唐雅》，“自武德迄于开元，以天宝而后，风格渐卑，故不与焉。”^⑤尊初盛唐者，对中唐以后则否定不取。樊鹏《编初唐诗叙》明言“大历以后，锄而治之矣”，王格《初唐诗序》曰“余观中唐以降，雕章缛彩，刻象绘情，多浮靡肤露之词。”^⑥王世贞甚至持论“大历以后书勿读，而藻饰太甚。”^⑦由是嘉靖以后，诗学领域的“四唐”优劣逐渐分化成“初盛唐”和“中晚唐”两大畛域。

“由初入盛”不仅是初唐派疗救李、何之习的药方，也是后来复古论者推尊初盛唐诗的出发点。在“初而逗盛”这一渐变过程中，四杰被视为发端和起点。这与《唐音》《唐诗品汇》在明代的流行和影响不无关系，但与二者不同的是，嘉靖之后，随着初唐诗的抬头，四杰逐渐被经典化了。《唐音》和《唐诗品汇》分别将四杰作为“律调初变”的“始音”和“稍变乎流靡”的“正始”之制，推崇的仍是“正音”和“正声”盛唐，故高棅的《唐诗正声》中四杰的诗歌很少入选，胡应麟谓“《正声》不取四杰，余初不能无疑。尽取四家读之，乃悟廷礼鉴裁之妙。盖王、杨近体，未脱梁、陈；卢、骆长歌，有伤大雅。”^⑧嘉靖二十七年（1548）胡缵宗编撰《唐雅》，撰序说明选诗之由“况诸本或不收杨、王、卢、骆，或不录李、杜、韩，或多入贾、温、许、李，则雅音不纯而或阙，谓为一代之诗，恐未可称尽美也。故缵宗所辑，必其出汉魏，必其合苏李，必其为唐绝倡，否则，虽工弗取。”^⑨胡氏在诗学思想上也是以盛唐格调为准绳，他非常推崇高棅的《唐诗正声》，曾序曰“诗自杨伯谦《唐音》出，天下学士大夫咸宗之，谓其音正，其选当。然未及见高廷礼《唐声》也。”^⑩可《唐雅序》中他明确对以前选本不收四杰等诗人表示不满，故而重新选辑唐之“绝倡”，序曰“今观唐诗，杨、王、卢、骆辟之日初升、月初出，其光皓皓，其色沧沧；陈、杜、沈、宋、李、杜、王、孟、高、岑、储、李、王、常辟之日既高、月既复，其光皓皓，其色盈盈；刘、钱、韦、柳辟之日未昃、月未

① 贾三强、余春柯点校《康对山先生集》补遗《〈樊子少南诗集〉序》，三秦出版社2015年版，第804页。

② 谢榛《四溟诗话》卷三，《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180页。

③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八二《徐孟孺》，沈云龙主编《明人文集丛刊》，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17册，第8294页。

④ 《诗薮》外编卷四《唐下》，第189页。

⑤ 永瑒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下册，第1752页。

⑥ 《唐诗总集纂要》，上册，第300—301页。

⑦ 《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第20册，第7381页。

⑧ 《诗薮》外编卷四《唐下》，第191页。

⑨ 胡缵宗《唐雅序》，《唐诗总集纂要》，上册，第331页。

⑩ 胡缵宗《刻唐诗正声序》，《唐诗总集纂要》，上册，第295页。

亏，其光晖晖，其色耿耿，皆可仰而不可及。”^①可见在其“可仰而不可及”的唐诗经典系列中，如“日初升、月初出”的四杰不可缺席。之后张逊业汇集《十二家唐诗》推出“初盛唐十二家法”，嘉靖三十一年黄埠梓行时总结其诗学思想“王、杨、卢、骆沿六朝之习，为天赋之才，实一代声律之发硎。自是文运益昌，乃有陈、杜、沈、宋倡于前，王、孟、高、岑继于后。”四杰以声律“发硎”者位列其中。这一选集在晚明颇有影响，隆庆年间，何东序“僭以己意，稍加哀择”编撰《十二家唐诗类选》，序中特别提到他人对四杰的疑问“诗取盛唐，四杰承陈隋之后，宫体犹存，纵辔馀骤，于雅道何居？”其应之“物极则反，莫不有其渐也。杨之明淡，卢之超迈，灵襟自得，不事雕巧，抑亦归正之囊籥乎？则唐人之盛，岂盛于盛之日哉？其所由来者渐矣。”亦认为学诗当循序渐进、由始入盛，故四杰不可不选。万历时孙仲逸《刻唐十二家诗序》又曰“上尽正始之英，中罗开元之美，外联甫、白之华，下杜中、晚之渐：有唐之盛，班然备于斯集矣。若曰得岸舍筏，学者奚必皆取资于是？是则非筏何以及岸？则是集也，岂非斯道津梁乎？”^②可知这“十二家法”在当时被奉为学诗的津梁。而且，这一学诗方法被后七子吸收和认可，据谢榛讲述：

予客京时，李于鳞王元美徐子与梁公实宗子相诸君招余结社赋诗。一日，因谈初唐盛唐十二家诗集，并李杜二家，孰可专为楷范？或云沈宋，或云李杜，或云王孟。予默然久之，曰“历观十四家所作，咸可为法。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哀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夫万物一我也，千古一心也，易驳而为纯，去浊而归清，使李杜诸公复起，孰以予为可教也。”诸君笑而然之。（《四溟诗话》卷三，《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189页）

在学诗“孰可专为楷范”的讨论中，谢榛认为张氏所选十二家再并入李杜，此十四家“咸可为法”，不必专宗李杜，“塑谪仙而画少陵”，从而得到李攀龙（于鳞）、王世贞（元美）诸君的认可。这说明了相对于“诗必盛唐”的前七子，后七子在取法门径上确实开阔了许多，四杰亦因此成为诗歌法式的经典文本。

初唐派的出现，也使得四杰在嘉靖以后进入明人的批评视野，而批评路径正是围绕着“由始入盛”这一渐变过程。如王世贞谓“卢骆王杨，号称四杰。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遗，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五言遂为律家正始。”^③胡应麟曰“先是，唐起梁、陈衰运后，诗文纤弱委靡，体日益下。宾王首与勃等一振之，虽未能骤革六朝余习，而诗律精严，文辞雄放，滔滔混混，横绝无前。唐三百年风雅之盛，以四人者为之先导也。”^④声律与风骨兼备、文质彬彬一直被视作盛唐之音的艺术特质，中晚明诗家着眼于这一特质将四杰肇始“唐音”具体归结于声律和风骨，而且突破了《唐音》和《唐诗品汇》将四杰各体一律视为“始音”“正始”的看法，在辨体溯源中进一步区分了他们在各诗体发展中的意义，由此，四杰在五言律诗和七言歌行二体上的贡献得以突显。近体之兴，五律为先，五律在初唐各家手里经历了渐次成熟定型的过程。相比沈宋、陈子昂、杜审言诸“律体之祖”，四杰虽声律未工、绮靡未除，但其首开风气的先导意义得到了中晚明诗家的一直认同。王世贞从气势骨力的角度称其为“律家正始”，赞曰“一变而雄，遂为唐始”^⑤。许学夷亦谓“四子才力既大，风气复还，故虽律体未成，绮靡未革，而中多雄伟之语，唐人之气象风格始见。”^⑥胡应麟虽认为“唐初四子，靡

① 《唐雅序》，《唐诗总集纂要》，上册，第331页。

② 黄埠《跋》、何东序《十二家唐诗类选序》、孙仲逸《刻唐十二家诗序》分别见《唐诗总集纂要》，上册，第340、343、341页。

③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历代诗话续编》，中册，第1003页。

④ 胡应麟撰，江湛然辑《少室山房集》卷八九《补唐书骆侍御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0册，第647页。

⑤ 《艺苑卮言》卷四，《历代诗话续编》，中册，第1007页。

⑥ 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辩体》卷一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

缚相矜，时或拗涩，未堪正始”^①，但对四杰的变创之功大加肯定“四杰固以巧丽为宗，然长歌婉缛，上继四诗，近体铿锵，下开百世，其功力匪邈小也。自五言律掩于沈宋王岑，七言古掩于少陵太白，后人展卷忽之，不思陈隋极敝之后，非四子草创厥初，盛唐诸公能遽抵妙境至此耶？”^②又谓“唐初五言律，惟王勃‘送送多穷路’、‘城阙辅三秦’等作，终篇不着景物，而兴象宛然，气骨苍然，实首启盛、中妙境。”^③四杰的歌行，自前七子开始就受到关注，并在创作中效习。何景明在《明月篇序》中称道其“风人之义”及“音节往往可歌”，甚至感叹杜甫“其调反在四子之下”^④？评价不可谓不高。然四杰在歌行上的创制之功为胡应麟首次阐明：

建安以后，五言日盛。晋、宋、齐间，七言歌行寥寥无几。独《白纻歌》、《行路难》时见文士集中，皆短章也。梁人颇尚此体，《燕歌行》、《捣衣曲》诸作，实为初唐鼻祖。陈江总持、卢思道等，篇什浸盛，然音响时乖，节奏未协，正类当时五言律体。垂拱四子，一变而精华浏亮，抑扬起伏，悉协宫商，开合转换，咸中肯綮。七言长体，极于此矣。……至王、杨诸子歌行，韵则平仄互换，句则三五错综，而又加以开合，传以神情，宏以风藻，七言之体，至是大备。（《诗薮》内编卷三《古体下·七言》，第46页）

胡氏认为歌行一体肇自六朝，但至初唐四杰始成体制，而且从篇幅结构、句式音韵、气势声情各方面总结了四杰歌行的鲜明特征。在他眼里，四杰虽“词极藻艳”“未脱梁、陈”，然“王、卢出，而歌行咸中矩度矣”^⑤。这一评价可谓一锤定音，直接将四杰的七言歌行推上不可改移的经典地位。四杰歌行宏丽的风藻、流转的声情、跌宕的气势在他这里定格，以至于后代学者论四杰诗及才气，多标举此体。前七子成员边贡《游仙词赠李羽士拟初唐四子体》一诗尚将“初唐四子体”定义为五言排律，而清人多将“王杨卢骆体”直接认定为歌行^⑥，即脱胎于此。

我们常谈到的文学经典，是指具有原创性，又被后世读者树立为典范的文学作品。由上可见，中晚明诗家正是基于四杰肇始唐音、开唐风气之先这一创始意义，将其标举为诗歌摹习的范本，并从诗歌的文质、体制诸方面对其经典性进行解读和定位，而背后的动因则是其尊崇盛唐之音的诗美理想和溯源别流的诗歌发展观。在这一过程中，“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⑦的四杰反过来进一步彰显了初唐的时代本色，从而使得“初唐四杰”这一称谓逐渐标签化、符号化。高棅曰学诗者“须要识得何者为初唐，何者为盛唐，何者为中唐，为晚唐”（《唐诗品汇》，上册，第9页），相比声律上精益求精的沈宋、以古体复归风雅的陈子昂等其他诗人，四杰身上“初唐”的辨识度最高，故晚明胡震亨谓：“至杨伯谦氏始揭盛唐为主，得其要领；复出四子为始音，以便区分，可称千古伟识。”（《唐音癸签》卷三一，第270页）

三 “文以行重，行以文远”：四杰德行与文集的全面推显

文学经典的建构和形成，除了源于作品自身的文学价值，同时也受到文本传播、作家接受、学术环境等

① 《诗薮》内编卷四《近体上·五言》，第58页。

② 《少室山房集》卷一一八《与顾叔时论宋元二代诗十六通》其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0册，第866页。

③ 《诗薮》内编卷四《近体上·五言》，第67页。

④ 《何大复先生全集》卷一四，《明代论著丛刊》，上册，第638—639页。

⑤ 《诗薮》内编卷三《古体下·七言》，第50、47页。

⑥ 周裕锴《王杨卢骆当时体——试论初唐七言歌行的群体风格及其嬗递轨迹》（《天府新论》1988年第4期）和陶易《试论王杨卢骆体》（《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对此有专门论述，可参考。

⑦ 陆时雍撰，李子广评注《诗镜总论》，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09页。

外部因素的影响。尤其在儒家诗教思想的影响下，传统的文学接受一般不将作家和作品割裂开来，文以行重，行以文远，文本作品的保存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作家的声誉及影响。四杰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四杰诗文在唐时即编次成集。《骆宾王集》由中宗降敕令郗云卿集成，凡十卷。《卢照邻集》，《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王勃集》，杨炯编次为二十卷。《杨炯集》，《旧唐书》本传称有三十卷。到了宋明时，四杰集已多寡互异、显晦不一。骆宾王的集子保存完好，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著录，除了唐时郗云卿十卷本，宋时还有“卷数亦同，而次序先后皆异”^①的蜀本，至明代，其集仍有宋本、元本存世。而其他三家的文集却未如此幸运。据《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洪迈《容斋四笔》载录，王勃集宋时尚有二十卷、三十卷、二十七卷本，然至明时，唐、宋旧本皆已亡佚。而卢照邻、杨炯二人文集，宋时即严重散佚，已非全本。

嘉靖时汇刻唐人文集的风气大兴，随着初唐诗的抬头，四杰也有多种一卷或二卷的合刻本。除了张氏《十二家唐诗》，它如嘉靖年间朱警编《唐百家诗》、嘉靖刻《唐六家集二十六卷》等^②，而且出现了专集《唐四杰集》。是集收四人诗赋各一卷，“建安杨太仆尝刻之于家”，嘉靖二十七年，建阳张明曾“重刊书坊以广其传”^③。万历以后，四杰文集的编纂刊传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其时杨炯诗文“世远遗逸，流传者仅诗一卷”^④，童佩“伐山而采群玉，披沙以检碎金”，辑得“诗赋四十二首，序、表、碑、铭、志、状、杂文三十九首，勒为十卷”^⑤，万历三年（1575）韩邦宪、涂杰明付梓刊行。崇祯年间，张燮（绍和）首次对四杰集进行全面整理和刊刻。他据所见诸书辑成《幽忧子集》七卷、《王子安集》十六卷，对误收的诗文予以厘正，将杨炯诗文重新编次为十三卷，又对盛传的八卷本《骆丞集》稍为诠次，从而辑成《初唐四子集》四十八卷^⑥。杨炯、王勃、卢照邻三家文集得以重新整理的同时，保存相对完善的《骆临海集》在万历以后频繁付梓，各种版本多达二三十种，还出现了多种训释、评注本，如刘大烈刻《新刊骆子集注》四卷、虞九章等注《唐骆先生文集》六卷、余仙源刻《新刻唐骆先生文集注释评林》六卷等。这一时期对四杰文集的编辑和刊行，为诗文作品的广泛流播提供了保障。尤其是四杰专集的出现以及张燮的集体整理与推行^⑦，对群体声名的稳固、文学经典地位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清张南山尝曰“又有建安七子，初唐有王、杨、卢、骆四家，余欲选黄仲则诗、王仲瞿文合刻之，题曰乾隆二仲。”^⑧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与刊传四杰文集同步的，是明人在刊刻序跋中对其功德的重新评价。四杰诗文长期以来不受重视、流离散落，与唐高宗时裴行俭对四杰的评鉴有莫大的关系。刘肃《大唐新语》载“时李敬玄盛称王勃、杨炯等四人，以示（裴）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也。勃等虽有才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者！杨稍似沉静，应至令长，并鲜克令终。’卒如其言。”^⑨后两《唐书》亦采录此事，在其影响下，宋人多聚焦于四杰的器识不足，如北宋孔平仲《珣璜新论》：“才大俊而器度狭，皆非远

① 陈振孙著，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題》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67页。

② 《唐百家诗》《唐六家集二十六卷》收王勃集、杨炯集、卢照邻集、骆宾王集各二卷，严绍璁《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下册，第1908页）、《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中册，第1398页）著录。

③ 程宽《唐四杰集叙》，《唐诗总集纂要》，上册，第327页。

④ 童佩《盈川集序》，祝尚书撰《杨炯集笺注》附录二，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册，第1543页。

⑤ 皇甫沅《杨炯集序》，《杨炯集笺注》附录二，第4册，第1544页。

⑥ 四人集后各有附录一卷，合计四十八卷，参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中册，第1391页。

⑦ 除了张明重刻《唐四杰集》和张燮所辑《初唐四子集》，《八千卷楼书目》卷一九载录明刊本《初唐四杰集》八卷，《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八亦著录叶石君藏明刊本《唐四杰集》八卷，各上下两卷，可知明代亦有八卷本专集。

⑧ 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乾隆朝卷“黄景仁”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册，第7415页。

⑨ 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卷七《知微第十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4页。

到之人也。”^①南宋王十朋《祭毛叔度主簿文》：“王、杨、卢、骆之徒，器识不足以远到，死固其理也。”^②器识以德业为本，李、裴之间器识与文艺的争论，本是历史上德行与文才、儒士与文士取士观念的分歧，裴行俭主张“先器识而后文艺”，反映了贞观时以经业为重的用人准则在武后大崇文章之选前仍在发挥作用。但自裴氏以此论衡“四才子”后，这一观念不仅在政治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③，其论断还关涉到文学批评史上的才性关系，并极大影响了后世对四杰文章的评价。在文艺学层面，才性本指作家个性气质与创作才能的关系，然古代的学术批评常将作家之性赋予道德伦理属性，才性多表现为人品决定文品的对应关系。故裴氏“浮躁浅露”“鲜克令终”之说，不仅推波助澜了历史上既有的“文人无行”“文人厄遇”“才子命薄”等认识，而且使得四杰的人品波及文品、诗文长期掩盖于器识之下。宋时《雪浪斋日记》即谓“陶、谢诗所以妙者，由其人品高。王、杨、卢、骆叫呼衡黜以为文耳。”^④宋人之所以对杜甫推举四杰产生质疑，其根本原由也在此。黄廓《碧溪诗话跋》云“志以言而章，言以文而远，文以叙而传，叙以德而久。”^⑤道德人品是明人编刻、推行四杰文集不可绕行的一个问题。

嘉靖时张明重刊《唐四杰集》以广其传，程宽作序，首先讨论的就是文章与德行的关系“余尝稽之三代以上，德行文章合于一，故其文也独盛；三代以下，德行文章离于二，故其文也日衰。盖根本之学无传，是以藻绘之风弥盛，陵夷至于六朝，盖已极矣。”紧接着他围绕着“根本之学”赞赏四杰的修养、节操和学问，进而推崇其文“使勃也少颖而能潜心伊祖白牛溪之学，炯也应制之后卧立园二十年能养其贞而自克其刚操，卢骆扼穷幽忧之地能求其远者大者而灵台裕如也，则文振八代之衰不待一韩退之而为之矣。”^⑥可见他所持论的仍是道德先行、人文合一的传统观念。万历以后，在心学影响下，对抗理学的性灵思潮兴起，强调人的本心、重视人的情性，对才性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李贽谓：“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⑦江盈科云“诗本性情。若系真诗，则一读其诗，而其人性情，入眼便见。大都其诗潇洒者，其人必鬯快。其诗庄重者，其人必敦厚。……譬如桃梅李杏，望其华，便知其树。”^⑧“性”与“格”屏蔽了道德因素，才性关系表现为：人的本真性格决定了创作风貌，反之，从诗文的才气风调也可以求人之真性情。在这种才性观的左右下，万历以后的刊刻序跋多从四杰文章的才气神采出发，去探究肯定四杰的修养品行。尤其是史载有“污点”的骆宾王和杨炯，二人的立身行事得以被重新审视和评价。骆宾王因随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一度被视为“叛逆”之徒。万历以后，骆宾王集刊刻得最为频繁，对其德行的申辩和呼声也最强烈。如叶逢春《骆子集叙》：“嗟夫！武氏一檄至今读之，令人凛凛，毛发洒然，即朽夫亦奋足而抚心，……故余尝谓一檄之力，大于五王之功，此其器识何如邪？”刘大烈《序骆宾王集后》引鸿江陈公曰“骆君诸艺，引物连类，穷情尽变，宫商相宣，金石谐和，文之杰出，世之希觐者也。诸君教多士以宪古振文，舍此奚其则？矧其生平气节凛凛，文辞严正，未可以成败论者。”^⑨“稍似沉静”的杨炯，《唐书》载其盈川任时为政严

① 孔平仲《珞璜新论》卷三，《丛书集成初编》，第284册，第35页。

② 王十朋著，梅溪集重刊委员会编《王十朋全集》卷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下册，第783页。

③ 如清阮元《嘉庆四年己未科会试录后序》：“伏思校数千人之文艺，必当求士之正者，以收国家得人能效。欲求正士，惟以正求之而已。唐裴行俭曰‘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器识之远大不易见，观其文略可见之。文之浅薄庸俗不能发圣贤之意旨者，其学行未必能自立。’”（阮元撰，邓经元点校《肇经室集》二集卷八，中华书局1993年版，上册，第572页）

④ 何汶撰，常振国、绛云点校《竹庄诗话》卷一《品题》，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页。

⑤ 黄彻《碧溪诗话》卷尾附，《历代诗话续编》，上册，第402页。

⑥ 《唐四杰集叙》，《唐诗总集纂要》，上册，第326—327页。

⑦ 李贽《焚书》卷三《杂述·读律肤说》，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2页。

⑧ 江盈科《江盈科集·雪涛诗评》“诗品”条，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806页。

⑨ 两序见载《新刊骆子集注》卷首、卷末，明万历七年（1579）刘大烈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酷，童佩整理其集时在序中首次提出质疑“故民请尸祝其地，至今春秋不辍。夫盈川之地，自有民物以来，不知历几何年，自侯诞灵而县始立。县自设长吏而下，不知历几何人，视所官之地亡而其神不亡。以意求之，侯利泽人民之深，盖必有他人之所难，惟是史册所载，尽略其治行，余窃疑焉。”^①他从杨炯惠泽当地、盈川民间祭祀的史实推断，其所施政必有他人所难之处，以至被清代四库馆臣批为“因其文艺而更粉饰其治绩”^②。深受性灵思潮影响的张燮，文艺上主张“不必谐于理也，而惬吾情；不必轨于法也，而舒吾素。”^③他对历代文人的评价亦以“赤心”、才情为先，如评史称“多愆礼度”的谢灵运、“轻薄多尤悔”的谢惠连，皆能推翻世儒的道德陈见，即使品行有小疵，也不影响肯定“才悟”与“佳句”^④。其辑刊四杰文集，也是出于对他们文章的推崇和才气的爱护，如《王子安集序》赞曰“公文大率从引满拥被酣畅得来，玄鹤争蜚，绛螭百变，即雕镂者所不能争其工。又字字俱有根蒂，非漫言者，小序碎金辉动衫袖。诸庙寺碑以三珠之树彩，增七宝之庄严，乃《乾元殿》等颂，何以不动同时之叹。”故而，他在序中“备书四杰忠孝之大”，抨击“裴氏以器识程人而抹杀文艺”，认为“四子本传，不过扬己护前，无所与让先辈见而恶之耳，若六朝伤化败伦之事，万万无，岂可投畀之死法中也？……四君子炳炳如此，不奖赏其忠孝之大节，而诋诃其褊急之小疵，顾不谬哉！”^⑤其对四杰品行文章的全力推行和表彰，被赞为“千年烟霭”^⑥之后“能微显阐幽者也”^⑦。

综上所述，四杰这一群体虽在当世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因长期被“器识”抹杀，其诗学意义至元末《唐音》才开始被重视。入明以后，随着“四唐”说的定型，“四杰”不仅在称谓上与“初唐”连缀，其接受境遇也与“初唐”在“四唐”轩轾中的地位息息相关。如果说嘉靖初诗学领域初唐派的兴起，促进了四杰文学典范和诗史地位的确立，那么万历以后性灵学说的冲击及才性观的变化，使得四杰终于从器识品行的揶揄中释放出来，文集与声名得以全面推显，四杰的经典化过程才基本完成。可见，元末至明代是四杰接受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段，之后清代直至今，学人对四杰的认识皆在其影响之内。文学经典最基本的特质是它的原创性和典范性，但其在后世被发现和确立的过程往往受到一定时期学术观念和文化思潮的左右。

从最初的“四才子”到诗歌史上耳熟能详的“初唐四杰”，人物并称的内涵也在逐渐丰富和变化。有学者很早就指出“王杨卢骆以‘蜀中四才子’而在益州一带得名。从发生的角度看，‘四杰’尤其不是一个诗史的名词，它指文才很大，同时部分地含有‘有才无行’的批评。”^⑧由以上论述可见，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四杰被视为“有才无行”的才子代表，作为“诗史”名词的四杰是从《唐音》才开始的。而“初唐四杰”这一称谓本身，即联系着学术史上唐诗分期发展和“四唐”说形成的诗学背景。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中，“才子”身份的四杰也一直发生着作用。在创作上，这一群体有明显的个体差异性，要解释其并称徽号历千载而下仍如此稳固且影响深远，除了从四杰及其创作本身探讨其一致性或“作为一个文人团体内部必要的协调性、趋同性”^⑨，更要从后世读者的接受态度和变化中寻找原因。“六朝之为有唐，四杰之力也”^⑩，“如未放之花”的四杰既代表

① 《盈川集序》，《杨炯集笺注》附录二，第4册，第1543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下册，第1278页。

③ 《霏云居集》卷三三《斋间十铭》，张燮撰，陈正统主编《张燮集》，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册，第618页。

④ 《群玉楼集》卷四〇《重纂谢康乐集序》《重纂谢法曹集序》，《张燮集》，第3册，第730—731页。

⑤ 王勃著，杨晓彩点校《王勃集》，三晋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⑥ 张燮《王子安集序》，《王勃集》，第2页。

⑦ 曹荃《刻初唐四子集序》，《王勃集》，第3页。

⑧ 吴光兴《论初唐诗的历史进程——兼及陈子昂、“初唐四杰”再评价》，《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

⑨ 林静《初唐“四杰”并称再探——以入蜀游历为中心》，《文学遗产》2015年第4期。

⑩ 陈仅《竹林答问》，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下册，第2254页。

“初唐本相”，又首开盛唐之先路，这一后世读者所发明的创变之功和诗学意义，无疑是支撑四人并称最硬核的一个因素和内涵。

[作者简介] 洪迎华，女，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出版过专著《唐两京与文学创作的文化学考察》等。

(责任编辑 刘京臣)

· 学术信息 ·

“经典之解释：第三届早期中国经典研究”学术研讨会召开

2022年12月17—18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主办的“经典之解释：第三届早期中国经典研究学术研讨会”在珠海成功召开。受疫情影响，本次研讨会通过腾讯会议在线上举办。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岭南大学、日本广岛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60余名学者出席会议，共收到论文63篇。本次会议主要围绕以下三大议题展开：

一、儒家经典的释读与经学阐释体系的建构。多位学者聚焦儒家《诗》《书》类典籍的释读，探究经学对文学、哲学、语言文字的影响。如过常宝（北京师范大学）发表对孔子论诗说“兴观群怨”的新解，沈立岩（南开大学）探微《尚书·金縢》祝辞的释意及其神灵观念，林甸甸（中国社会科学院）分析了先秦祝告话语的核心结构及其书面形式凝结过程，程苏东（北京大学）对郑玄经学体系中的《洪范五行传》注进行了考论，石城（湖南大学）对《白虎通义》体例、性质进行了分析，总结了汉魏六朝经学“通义”类著述的体例特点。

二、新出土文献的释读与传世文献的考证。多位学者对海昏侯简、安大简、清华简等新出文献进行了释读。如季旭升（郑州大学）考辨了清华拾《四告》简8—9的疑难字句释义；马楠（清华大学）通过释读海昏侯《诗》简探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诗类小叙中关于鲁诗的问题。此外，多位学者对传世文献有新探索。如苏芃（南京师范大学）对《汉书》臣瓚旧注的诸多异文加以研讨，推断臣瓚“集解”本《汉书》的体式，王京州（暨南大学）对国图藏仿宋抄本《初学记》文献价值进行深入阐发。

三、早期中国经典的海外传播与域外汉籍的文献价值。本次会议既有海外学人的最新研究，也有对海外汉学的介绍。如陈翀（日本广岛大学）认为日本庆应义塾图书馆新入藏的南北朝末隋写本《论语疏》实为后世摹本，铃木俊哉（日本广岛大学）对日本江户期写本群原本《玉篇》卷一九错简问题与传抄关系进行了探讨，张月（澳门大学）对2000年以来海外陶渊明研究进行综述。

会议论题广涉四部，而以经学研究为大端，呈现出经史、文史通融的研究特点，体现了扎实的文献功底和跨学科的视野。参会论文立论高远、思路缜密，兼顾广大和精微两端。季旭升教授在总结发言中强调，“经”是中国文化的底蕴所在，维系着两千五百年来的文明延续与民族自信，也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更加深远的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邬志伟)